

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 回顾与思考

陶文钊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的演变历程,指出38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并对21世纪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的发展走向进行了思考。建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上是在波折中向前发展。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战略扩张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冷战结束之初,虽然美国出现了“中国崩溃论”,但鉴于双方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冷战结束的冲击,重归正常化。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美国转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却已难以束缚中国。从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日渐增强,并取得了较大成功,具体表现为同美国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进入21世纪,中美两强并立将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两国关系也将越来越多地涉及国际秩序。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中美之间将经常进行相互调适与顺应,两国之间仍会有分歧与摩擦,但将沿着建交以来的主要方向向前发展。

【关键词】中美关系;中美建交;国际秩序;战略机遇期

【作者】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引用】陶文钊《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回顾与思考》,《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1期,第12~24页。

从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38年来的两国关系并非一帆风顺,经历过许多波折和起伏,甚至有过大起大落。但总体上,两国关系是向前发展的。建交之初,邓小平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这种定位是完全正确的。几代领导人的对美外交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处理为中国的崛起和确保战略机遇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大业。

一 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

以冷战结束为分界线,38年来的中美关系总体可以分为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两个阶段。冷战结束对中美关系的冲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釜底抽薪”;第二,使美国产生了中国即将步苏联解体后尘的幻想。

从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两国关系正常化,再到里根总统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基本驱动力是对抗苏联的战略扩张。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对抗苏联扩张的战略基础由此消失。美国方面随之产生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还需要中国?如果需要,原因为何? 如果不需要,中美关系如何发展?

从中国方面来看,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的外交战略就从联合美国抗衡苏联逐步进行回调,而且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一直到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① 当1982年夏季,中国在与美国艰难地谈判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之时,中国领导人决定大幅度改善中苏关系,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这一年,中国领导人的多次讲话突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再强调苏联的扩张,而是恢复了对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抨击。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致的开幕词、胡耀邦所作的报告都提及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②

^① 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对于中美,是从彼此不承认对方政府到相互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对于中苏,两国早已建交,而且外交关系从没有中断,正常化是指寻求一种彼此接受的维持国家关系常态的基础。参见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04页。

^②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修订本,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139页。

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在政治、经贸、军事、人文和技术转让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逐渐变得多元。若无这些发展,中美关系是很难经受得住冷战结束的冲击的。

苏联解体后,在美国出现“中国崩溃论”。美国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认为,既然共产党执政70多年的国家都可以迅速地分崩离析,那么中国有可能步苏联的后尘。一些人认为,“中国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的边缘”。^①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于1989年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撰文指出,“到本世纪末,中国就会起大变化”。这种看法在美国相当普遍。^②1992年,参加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说到,“中国有一天也会走上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路。美国必须竭尽所能来鼓励这个进程。”^③在克林顿总统当政的前三年,中美关系经历了很多曲折和动荡,如“银河号”事件、美国国会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用人权问题打压中国、把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提升美台关系,如此等等。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非但没有垮,而且在邓小平“九二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出现新高潮,经济持续增长。“形势比人强”的事实使美国决策者认识到,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是互有需要的。1997年10月24日,克林顿总统在亚洲协会和美中教育基金会举办的会议上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列举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六个方面的共同利益,反映出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新认知。这是经过数年实践得出的认知,来之不易。^④之后,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克林顿总统1998年6月的回访是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重新正常化的标志。所谓重新正常化,是指中美两国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有了这种重新正常化,接下来的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定。2000年,美国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这个立法意味着中美关系出现实质性突破,使两国经贸关系建立在更加坚实

① Harry Harding “Red Star Rising in the East,”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9, 1997, p. X-4.

② Jim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p. 229.

③ 卫兴华《掀开西方“普世价值”的面纱》,《人民日报》,2015年11月30日,第7版。

④ William J. Clinton, “Remarks to the Asia Society and the United States-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Boar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October 24, 1997,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53450>.

的基础之上,持续为两国关系提供新的动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十年是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强劲拉动经济腾飞的黄金十年,这是中美关系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大业的极好例证。虽然这一时期发生了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但经过重新正常化的中美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双方都努力把冲击控制在较小范围、较短时间之内,努力减少事件对两国整体关系的损害。

到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又出现了新变化。2008年,虽然发生了汶川地震,中国仍然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夏季奥运会。一些美国主流媒体认为,北京奥运会展示了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中国实力与形象的一次成功展示,中国已经在国际舞台上登台亮相。^①2010年,上海又成功举办了世博会,再一次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逆势上扬,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国际机构认定中国的GDP超过美国只是早晚的事。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美国可能结束超级大国的地位,成为“同等大国中的首位”(first among equals)。^②

所有这些产生的累积效应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皮尤公司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总体好感的比例从2009—2011年的50%左右下降到了2012年的40%和2013年的37%。“中国威胁论”似乎变得比以往更加现实和突出。^③奥巴马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世界上最大的民营太阳能研究中心在中国,运算最快的计算机在中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斯布特尼克时刻”。^④2010至2011年前后,美国战略界达成共识:中国是今后数十年中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奥巴马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实行战略转向,或曰“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政府实施这个战略有复杂的背景,但平

① Amy Shipley, “China’s Show of Power,”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5,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8/24/AR2008082400851.html>.

② Matt Smith, “U. S. to Face 2030 a ‘First among Equals’: Report Projects,” CNN, December 11, 2012, <http://edition.cnn.com/2012/12/10/us/intelligence-20130/index/html>.

③ James Steinberg, Michael E.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 S. – 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72.

④ Barack Obama,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anuary 25, 2011,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88928>.

衡中国的崛起无疑是这个战略的重要目的之一。为此,奥巴马政府加强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尤其是美日关系;加强与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利用亚太地区的一些多边机制约束中国;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挑起争端;执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①“再平衡”战略给中美关系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它削弱、损害了两国间的相互信任。美方在各种场合一再解释,这个战略不是针对中国的,不是为了牵制中国,但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②其次,“再平衡”战略中的军事因素突出,扰乱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再次,“再平衡”战略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复杂,给中国的崛起增加了麻烦和羁绊。^③当然,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后,中国已经足够强大,不会被美国的战略调整所束缚。

二 塑造中美关系的中国因素

38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一个大趋势,即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越来越强。中美建交之初,中国的GDP占全球GDP总量的2%,美国占25%。现在,美国占23%,中国占14%。中美两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

① 曾任奥巴马政府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的亚伯拉罕·登马克(Abraham Denmark)撰文分析中国反对部署“萨德”的原因称,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个技术性军事部署问题,而是美国在中国后院依然拥有力量的象征。“部署‘萨德’无异于持续遏制中国追求地区主导地位的大国战略”。他的分析恰恰从反面证实了美国部署“萨德”是牵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参见 Abraham Denmark, “China’s Fear of U. S. Missile Defense Is Disingenuous,”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1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3/20/china-fear-of-u-s-missile-defense-is-disingenuous-north-korea-trump-united-states-thaad/>。

② 王缉思在2016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说到,从2012年他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联名发表《中美战略互疑》的报告以来四年过去了,当时所观察到的双向怀疑和不信任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多、更深了。参见王缉思《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常态”》,环球网,2016年8月19日。<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08/9330046.html>。

③ 这个战略的设计者之一、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9·11”以后,美国全副精力投入了中东和南亚的冲突,亚洲对美国来说再次成了次要的舞台。中国乘机机会在各方面迅猛发展,“在历史上,极少有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这样多的收获,却没有遭到现存大国的反应”“美国历史上保卫其利益的办法,防止在亚洲出现一个霸权国家,仍然是美国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参见 Kurt Campbell, *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 (New York: Twelve, 2016), pp. 121, 145-146。

国的军力在 21 世纪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中美两国建交伊始,中国就努力塑造中美关系,在各个不同时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举措和步骤,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建交后不久,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交时遗留下来的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努力促成了 1982 年 8 月 17 日《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公报》虽然没有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但它表明了中美双方都不愿意让售台武器问题阻碍两国的正常交往,也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和条件。

在中美关系遭到严峻考验的 1989 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既沉着坚定,保持定力,又与美国政界中以布什总统为代表的中美关系的积极力量相互配合,避免了两国关系的倒退。^① 在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内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对美方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又强调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方针,^②积极谋求改善双边关系。“炸馆”事件发生后,中国领导人强调“既要反对霸权主义,也要同美国发展关系。不能因为反对霸权主义而放弃发展关系,也不能因发展关系而放弃反对霸权主义”,^③既支持群众的爱国热情,又注重把群众情绪引向正确方向。中美就中国“入世”进行谈判时,中国领导人在加入世贸组织、投入全球化大潮方面坚定不移,同时,又指示谈判团队努力维护中国利益,终于在 20 世纪末结束了这场谈判,抓住机遇,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时候加入了世贸组织,从全球化中赢得了最大的收获。在 21 世纪最初几年,民进党在台湾当政、力图搞法理“台独”时,中国一再对美国做工作,强调坚决反对和制止“台独”,重申维护台海和平

① 1989 年,美国国会和社会上要求制裁中国,终止对华最惠国待遇或实行有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声浪甚高,布什总统努力加以抵制,把对中国的制裁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和较短的时间,并仍然延长对华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他明确表示,“我在中国生活过,我了解与中国人民和政府保持关系的重要性”,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我想做的是尽我所能保持这种关系”。参见 George Bush,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une 8, 1989,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7128>。

② 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 年—2000 年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2001 年版,第 93 页。

③ 江泽民《在欢迎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 年 5 月 14 日,第 1 版。

稳定符合中美共同战略利益,^①使台湾问题成为这一时期两国的一个重要利益汇合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领导人不失时机地、妥善地把国力增强转化为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近年来,这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美国合作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对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G20 机制使中国参与到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决策之中,给中国在国际上施展影响力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同时,中国也注意同有关各国,尤其是与美国保持沟通,协调立场。2009年4月伦敦 G20 峰会召开之前,胡锦涛主席会晤奥巴马总统,就一些即将在峰会上讨论的问题,如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问题、金融监管问题等,在两国首脑之间进行了沟通,达成了共识。^②一直到2016年杭州峰会,中国作为主席国提出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智慧,倡导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引起国际社会的积极反响。

第二,把应对气候变化打造成中美关系的一大支柱。虽然国际社会对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评价众说纷纭,但中国在此次会议上彰显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此后,中国认为,若要推动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方面取得共识,在2015年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中美两国要带头、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自身需要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高度契合。美国民主党政府、奥巴马总统本人、前国务卿克里都十分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奥巴马甚至说“伊斯兰国对美国不是生死攸关的威胁,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的话,气候变化对全世界都可能是潜在的生死攸关威胁”。他把气候变化称为“缓慢发展的紧急事态”。^③2013年4月,中美两国发表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两国同意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并根据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愿景,确定推进技

① 《胡锦涛昨晚同布什通电话》,《人民日报》,2005年12月7日。

② 《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新华网,2009年4月2日。参见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090402/15412059.html。

③ 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The Atlantic*, April,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此后,两国的合作不断深化。2014年11月,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两国元首发表声明,分别宣布了各自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举措。这是中国第一次宣布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回应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期望。美方宣布的减排目标也高于以往设定的目标。^① 2015年9月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中美双方再次发表联合声明,决心携手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在巴黎气候峰会上达成一项富有雄心的协定。^② 2016年3月31日,两国元首再次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于4月22日签署《巴黎协定》,将尽早参加《巴黎协定》。声明号召其他国家采取同样行动,以使《巴黎协定》尽早生效。^③ 正如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杭州会晤成果清单中所说,两国领导人推动中美在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建立了历史性的伙伴关系,气候变化合作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一大支柱。^④

第三,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于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沉着、冷静地予以应对,既没有看成“不得了”,也没有看成“无所谓”。^⑤ 中国领导人根据中美关系30多年的发展经验,从全局、从长远来把握中美关系,提出了构

①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新华网,2014年11月12日。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1/12/c_1113221744.htm。在声明发表的当天,克里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题为《中国、美国与我们这个越来越热的星球》的文章指出,今天的“宣布将为三个星期后在利马恢复的全球气候谈判以及明年达到高峰的巴黎会议注入势头。两位领导人在各自国家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动并紧密合作排除通向巴黎的障碍的承诺,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必须达成协定,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将做到。声明也是美中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参见 John Kerry “China, America and Our Warming Planet,”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 2014, <https://www.nytimes.com/2014/11/12/opinion/john-kerry-our-historic-agreement-with-china-on-climate-change.html>。

②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新华网,2015年9月26日。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6/c_1116685873.htm。

③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新华网,2016年3月31日。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4/01/c_128854045.htm。

④ 《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中方成果清单》,新华网,2016年9月5日。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4/c_1119508276.htm。

⑤ 这是参加2012年6月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任海泉中将的说法。参见《中国军方:若国家根本利益受威胁,反击将令人恐惧》,凤凰网,2012年6月3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nanhaizhengduan/content-1/detail_2012_06/03/15004795_0.shtml。

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2013年6月7至8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习主席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①

这三条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决定和解以来,两国就在探索如何建立彼此的关系。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对手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同于与别的国家的关系。这是两个历史、文化和传统不同的国家,两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但中国不寻求意识形态的扩展;这是两个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国力相差甚大,但中国又有着无与伦比的发展潜力。如何构建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两国都是一个挑战。现在再回过头去研读1972年2月的《上海公报》可以看到,《公报》已经蕴含着上面三条的基本思想。中美双方都同意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强调两国关系正常化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公报》强调了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扩大在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互利交流。^②现在可以说,过去45年来中美两国对构建新型关系的探索是成功的。今后45年,如果中美两国关系能够维持现在这样的格局,两国间有分歧,但没有大的冲突;且合作大于分歧,分歧基本能得到管控;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实行了现代化,真正崛起,那么就可以说实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特朗普当政以后,虽然暂且不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说法了,但精髓还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三条依然是发展中美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国务卿蒂勒森2017年3月中旬访华时,一再表示中美关系要以这三条原则为指导,不管蒂勒森的表态出于什么考虑,表态本身是积极的。

① 《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国务委员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第1版。

② 钟建和编《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137页。

三 中美关系与 21 世纪国际关系

此次金融危机以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出现了美国是否衰落的辩论。现在在美国内政外交确实都有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但笔者认为美国并没有衰落。第一,美国的制度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历史上呈现过多次。第二,美国的核心创新能力仍然是全世界最强的。第三,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没有动摇。第四,美国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第五,虽然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大为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似乎衰落了,但与欧洲、日本、俄罗斯、巴西等国家相比,美国都没有衰落。而且,中美两国实力的绝对差距还很大。此外,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理由。美国人说美国衰落,是“恨铁不成钢”。^①

中国确实在不可遏制地崛起,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多边主义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强并立将是 21 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并将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因此,中美两国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涉及国际秩序。直到 20 世纪末,“与国际接轨”仍然是中国流行的口号,中国在“入世”时从中央到地方清理和废止了数千条大大小小的法规,中国的开放基本上是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到 21 世纪初,由于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问题开始出现。中国是不是能继续在现存的国际体系里崛起,或者要突破这个体系,甚至另建一个体系?美国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5 年 9 月 21 日,前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关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讲话把这个问题挑明了。佐利克讲话的积极意义在于,美国承认中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不再把中国视为与国际体系相对立的“异端国家”,这对于双方进一步探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积极贡献。^②佐利克说,“从中国的角度看,与我们一起工作来构建未来的国际体系将更好地服务于其国家利益”。^③他看似是在为中国着想,但真实意图是要中国与美国一起

① 徐彤武、魏红霞《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访王缉思教授》,《美国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7~18 页。

② 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28 页。

③ 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September 21, 2005, <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来维护现存的体系并构建未来的国际体系,也就是说,中国不要另搞一套。而且,由于美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领导,佐利克的讲话也隐含中国不要试图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的意思。

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是不断变化的,而反映两者关系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却有一定的稳定性。尤其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两者之间的不相称、不协调的地方显得更加突出。2009年,20国集团匹兹堡峰会确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只是为了解决这种不合理性的一个初步的改革,而这一改革实属来之不易,美国国会一直拖了五年才批准,说明改革的阻力如此之大。而另一方面,奥巴马却始终在抱怨中国“搭便车”。^①

中国的发展给中美双方都提出了一个如何相处的问题。20世纪,中国经济还很弱,美国人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中国的,根本没有想过中国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问题,跟中国的争议局限在个别问题、个别商品,如纺织品、知识产权保护等。现在,美国看到了中国的实力和发展势头,不情愿地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虽然,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曾经说到,美国已经准备好中国登上世界舞台,^②但真正登上了,美国还是不习惯,不适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领导世界”“美国世界第一”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次理念,成了美国人的普遍心态。正如尼克松所说,我们美国人不知道如何成为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如何成为并列第一。大部分美国人没有心理准备接受中国为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美国拒绝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AIIB或亚投行)就是一例,奥巴马政府认为这是中国想树立在国际舞台上的霸权地位,因此,对亚投行

① 奥巴马不止一次抱怨中国搭便车。2014年8月,他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omas Friedman)采访时谈到伊拉克形势,抱怨中国只开发伊拉克的石油,却不帮助美国维护伊拉克的安全形势,而且说“中国30年来都在搭便车”。

② James Steinberg “China’s Arrival: 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Power,”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September 24, 2009, <https://www.cnas.org/events/chinas-arrival-the-long-march-to-global-power>.

给予抵制。^①

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塑造国际秩序需要超强的国力,中国离这样的国力还有很大差距。^② 塑造国际秩序也需要得到本地区国家的普遍支持,需要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各大国的普遍支持,中国离这样的国际支持还有较大差距。实际上,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反而产生了种种疑虑。比如中国与东盟,尽管十多年来各方面的关系都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经贸关系增长迅速,但是战略互信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东盟信奉大国平衡战略,在中国实力迅速提升的背景下,东盟的外交政策向着“平衡中国”倾斜,^③中国与一些国家还有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另外,现存的国际秩序并没有严重束缚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只能无所作为。

今后几十年,现存的国际秩序仍将延续,但新的因素会不断涌现,使这个秩序得到补充、改善。国际秩序要与时俱进,要反映变动了的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大趋势。在这方面,中国对国际秩序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中国可以在某些特定领域,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循序渐进地推动现有国际秩序的局部改善,并对这个秩序不断进行补充,使之丰富和完善。这次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没有金融危机,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现有的国际机制会困难得多,国际既得利益者对中国的抗拒会强大得多。发生了金融危机,由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和贡献,国际社会需要中国来帮

① 《弗朗西斯·福山:美难以接受与中国平起平坐》,参考消息网,2017年4月18日。参见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7/0418/1898620.shtml>。中国一直努力与美国就亚投行问题进行沟通。直到2015年6月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讨论了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问题,中方极力打消美国的疑虑,美国才开始调整对亚投行的立场。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两国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方面达成进一步谅解,美方表示欢迎中方不断增加对亚洲及域外地区发展事业和基础设施的融资支持,中方表示要加强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发展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的捐资支持,中美在亚投行问题上的较量得到妥善解决。参见《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成果清单》,新华网,2015年9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6/c_1116685035.htm。

② 唐世平《塑造国际秩序需要超强国力》,环球网,2017年4月14日。参见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7-04/10473533.html>。

③ 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

助稳定全球金融,复苏世界经济,勉强地接受中国的参与。而中国则积极、稳妥地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并取得显著成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发起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尤其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版的全球化蓝图。

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将是原有的国际秩序逐渐向新秩序过渡的时期。如果中国不使用强制的方法去改变原有秩序中的某些成分,如美国的同盟体系;如果美国不使用强制的方法阻止中国对现有秩序的局部改善和补充,中美两国就可以避免冲突和对抗,避免战略摊牌。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提出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是在现存国际秩序之外创造一个平行的体系,是为国际社会提供现存秩序的替代品。^①但即便这是两个平行的体系,也不一定是冲突性的,也不至于导致中美的对立。因为,参与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成员,许多甚至是美国的盟国,所以,这两个体系仍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关于亚投行问题的较量和最后达成谅解就是生动的例证。

在今后几十年的漫长过程中,中美两国之间将进行经常的相互调适,相互顺应(accommodation and adaptation)。直到现在,中美之间的根本认识问题不能说已经解决,这就是:美国认为在此后几十年中世界上唯一可以挑战美国全球地位的国家就是中国。因此,有的美国人甚至认为,即使中国和平崛起,对美国仍然是一个挑战。中国则认为,如果有一个外部力量可以阻止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不是别的,就是美国。在认识问题上,中美也要“相向而行”:美国要“脱敏”,消除对中国发展的过敏心理。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中国寻求合作共赢,寻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真诚的。中国也要顾及美国对贸易逆差的感受,顾及“铁锈带”失业工人的感受,努力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在提出新倡议的时候,适当考虑可能对美国产生的影响。中美两国虽然有分歧,两国关系时不时有摩擦,但两国关系还是将沿着建交以来38年多的主要方向向前发展。

【责任编辑:张超】

① 一位美国知名中国学家对笔者的谈话,2015年5月1日。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view

Vol. 1, No. 1, 2017

Abstracts

President Trump'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Sino-US Relations

WANG Jisi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ump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and the key factors which might affect the futur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merican First" i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Trump Administration'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es. While there are many uncertainties in Trump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approach, its strategic intent is quite clear. President Trump is very transactional in foreign policy, and his foreign policy concerns may give way to American domestic priorities. The United States may pursue a "low input, high yield" foreign policy by reducing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requiring allies and partners to share more burdens. Seemingly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willing to take more risks in foreign policy. The mix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s a "new normal" for Sino-US relations, which will continue in Trump Administration. Trump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is very much issue-oriented and result-oriented, and the DPRK nuclear challenge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trajectory of bilateral relations.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rump Administration; DPRK nuclear issue

[Author] WANG Jisi,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ident,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Citation] WANG Jisi, "President Trump'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Sino-US Relations,"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view*, Vol. 1, No. 1, 2017, pp. 1 – 11

The Retrospect of and Reflection on Sino-US Relations since 1979

TAO Wenzhao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Sino-US relationship since 1979, highlighting the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38 years, and reflecting on the future China-US bilateral ti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Even though there are twists and turns, China-US relations have moved forward in an incremental way. In the Cold War era, Soviet Union's strategic expansion once w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Sino-US relations were negatively affected.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shared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might have moved backward significantly.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found new anchor i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political,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China is gaining more power in shaping the direc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such as in dealing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and coping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potential challenge posed by a rising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the strategy of Rebalance to Asia. Meanwhile, China proposed to develop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hape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Likel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djust itself to the rising of China, 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ll develop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der; Rebalance to Asi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Author] TAO Wenzhao, Honorary Academici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enior Fellow,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TAO Wenzhao, "The Retrospect of and Reflection on Sino-US Relations since 1979,"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view*, Vol. 1, No. 1, 2017, pp. 12 - 24

Trump Administration'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NI Feng**

[Abstract] Mr. Trump's victory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casts big shadow over America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ompeti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s becomes the new political reality in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plagued by a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y team far from complete, small group decision making, governance by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s, press conference via tweets, and fierce partisan politics in Capitol Hill. President Trump'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American rol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his predecessors, and he emphasizes "American First" by reducing American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asking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Trump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tends to be inwardness-oriented and transactional, and this brings about both great challenges and major opportunities for Sino-US relations. With the Mar-a-Largo summit in April, 2017, both countries started the initial interaction in a positive way. Considering the internal fights in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President Trump's preferenc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hina and US may experience further challeng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landscap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rump Administration

[Author] NI Feng,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and Senior Fellow,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